

环东海文明互动与 东亚区域格局研究

陈国灿 于逢春 主编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国家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资助

环东海文明互动与 东亚区域格局研究

陈国灿 于逢春 主编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东海文明互动与东亚区域格局研究/陈国灿, 于逢春主编.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103-2070-5

I. ①环… II. ①陈… ②于… III. ①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研究—东亚 IV. ①G125 ②G131.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2565 号

环东海文明互动与东亚区域格局研究

HUAN DONGHAI WENMING HUODONG YU DONGYA QUYU GEJU YANJIU

陈国灿 于逢春 主编

出 版: 中国商务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东后巷 28 号 邮编: 100710

责任部门: 商务与法律事业部(010-64245686)

网 址: <http://www.cctpress.com>

邮 箱: cctpress1980@163.com

排 版: 浙江大春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字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3-2070-5

定 价: 98.00 元



凡所购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总编室联系。(电话: 010-6421224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盗版侵权举报可发邮件到本社邮箱: cctp@cctpress.com)

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几点思考（代序）

陈国灿

建设区域共同体是当今世界合作与发展的潮流。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大洲不同地区大多建立了形式不一的区域合作组织和共同发展机制，诸如欧盟、东盟、阿盟、非洲统一组织、太平洋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等，就连矛盾与冲突不断的南亚也开始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这些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区域共同体与国际组织，在协调国际关系和推进各国交流、合作与共赢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就东亚地区而言，建设区域共同体，推进区域合作与发展，也是东亚各国和各地区谋求共兴共盛的迫切需要和现实路径。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和迅猛发展，东亚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区域国际关系和秩序持续动荡。可以说，构建地区共同体，形成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有效机制，已成为化解东亚区域矛盾和冲突，谋求共同兴盛和繁荣的现实趋势。

正是由于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基于区域发展的实际需要，构建区域共同体和合作发展机制已越来越成为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共同愿望，要求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2001年，韩国领导人建议将东盟“10+3”领导人峰会发展成为包括政治、经济、安全诸领域在内的东亚共同体和区域合作机制；2004年，在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上，与会国家作出了未来建立东亚

共同体的约定。在 2005 年的东盟“10+3”会议上，与会国家又重申了共同致力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2009 年，在上海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上，中国政府表示将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日本官方也首次表示，希望这一构想经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后，能在不太远的时期内得以实现；同年，中国领导人在访问日本前夕再次重申，构建东亚共同体和实现区域合作应成为中日两国共同推动的目标。

然而，在当今国际形势和地域格局下，建设东亚区域共同发展组织却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阻碍，其中既有东亚各国民族主义情绪趋于高涨的牵制，又有区域内领土和主权纠纷呈不断加剧之势的影响，还有区域外部势力的插手和阻挠。在这种情况下，要克服当前各种困难，加快东亚区域共同体建设，推进区域合作的不断发展，必须转变思路，根据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围绕文化和海洋两个基点来展开。

首先，共同的文明传统和文化共性是构建东亚区域共同体、促进区域包容与合作的重要前提。从历史角度看，东亚地区有着共同的文明基础和相通的文化认知。通过彼此交流与融合而形成了“东亚文化圈”，东亚各国和各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具有以儒学为核心的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诸多同质和相近的文化特性。尽管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内忧外患，恩怨沧桑，维系区域文化体系的认同基础逐渐削弱，甚至呈现各国在文化上分道扬镳的趋势。但就整体而言，东亚地区仍具有共通、共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在文字、文化底色乃至族群等方面有着很多相近或相似之处。通过追求共同的文化认知，强化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化解东亚区域矛盾和冲突，形成谋求共同兴盛和繁荣的区域主流意识。

其次，海洋是推进东亚区域共同体建设和加强区域合作的有效载体。在东亚文化共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海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以海洋为纽带实现的，在东海、黄海乃至日本海上，形形色色的文化群体东渡西进，他们将华夏文化传播到异域。可以说，历史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以海洋为载体实现的。21 世纪是人类进一步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新时期，海洋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联

系纽带和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合作的重要舞台。当下借助文化共性来探寻东亚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不可避免地需要将视角转向海洋，并期以海洋为中心，在更广阔的领域探寻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路径。

进一步来讲，围绕文化和海洋两个基点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一方面，需要针对当前东亚地区的实际形势及其特点，在挖掘、传承、发展区域文化共性的基础上，以文化相通化解对立情绪，增强共识，着眼未来，谋求东亚地区的共同发展和持久和平；另一方面，依托海洋深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兴。具体需要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重振海洋文化共同体。通过海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进东亚文化圈的历史复兴与当代发展；二是强化海洋经济共同体。积极开展海洋经济合作，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及其可持续发展；三是形成海洋命运共同体。通过积极构建合理、稳定的区域海洋秩序和国际关系，以及各国和各地区共同发展的有效机制，推进环东亚海洋圈的共同兴盛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

目 录

上篇 文明互动与文化交流

宋朝海商与中日关系	陈国灿 3
元代浙江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	刘恒武 马 敏 18
明清时期闽人与琉球交往考叙	赖正维 34
壬辰战争背景下中朝地方和民间一次儒学文化的深度交流 ——以鲁认《锦溪集》和《锦溪日记》为中心	刘永连 57
清前期(1684—1784 年)东南沿海 与台湾的贸易往来	王兴文 陈 清 74
中国篆书书法与江户时期日本 ——以泽田东江《篆说》为中心	曹 悅 84
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入品结构 ——以广州、长崎为对象	刘 钦 张晓刚 111
晚清中日间轮船航运与东亚交流	松浦章 145
作新社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态势	付建舟 156
东北亚区域视野下近代外国记者在华活动述论	宋铁勇 166

下篇 地缘关系与区域格局

东鳀考：4世纪前的东亚海域世界	陈博翼	177
明嘉靖三十七年琉球册封使吴时来的秘密使命与明琉关系	年 旭	199
明清鼎革以降中日韩三国“华夷观”演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	于逢春	220
从汪楫《使琉球杂录》《中山沿革志》看清初中琉之交流与关系	李圣华	251
略论李鸿章近代前期的对日主张	陈可畏	270
清同治年间日本侵台与海防论争之起	刘石吉	279
满铁铁路自警村移民初探	李淑娟	296
东亚国际关系背景下琉球(冲绳)的国家认同	徐建新	315
修宪运动背景下自卫队参与PKO制度之演变	张晓刚 邹圣婴	328
日本安保法制的“光”与影及对我国海洋安全立法的启示	陈根发	341
东亚海洋共同体构建	夏立平	352

上篇

文明互动与文化交流

宋朝海商与中日关系

陈国灿

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宋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一方面，随着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对外交往渠道由陆路全面转向海洋，进而形成了以海洋为依托的开放格局；另一方面，由于宋政府统治思想和有关政策的调整，民间取代官方，成为中外交流的主导力量。特别是日益壮大的海商群体，不仅是海外贸易的主力军，而且在中外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关宋朝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与特点，以及海外贸易的空前兴盛，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①本文试在此基础上，就海商群体的发展壮大及其在宋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番具体考察与分析，以进一步认识此期中国社会向海洋发展所引发的中外关系变动。

^① 中外学界围绕宋代对外关系和海外贸易的讨论，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有：冒志祥：《宋朝的对外交往格局》，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赵成国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史（宋元卷）》，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3年；杨渭生：《宋丽关系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陈高华、吴泰：《宋元海外贸易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纯艳著《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日）桑原骘藏著《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译本），杨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日）藤田丰八著《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中译本），魏重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等。

一、宋朝海商群体的壮大

历史上，海商是伴随海上贸易的兴起而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前期，对外贸易的重心在西北内陆，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展开，海上贸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属于小规模的零散现象。中唐以后，由于西北陆上贸易通道受阻，海上丝绸之路快速发展，海洋贸易日趋活跃，民间海商势力逐渐兴起。有学者统计，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到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唐朝海商赴日贸易的次数仅见于史载的就有36次。^①他们大多结队而行，具有一定规模。据日本文献记载，在仁明天皇承和14年(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以张友信为首的唐商团队有47人；^②在清和天皇贞观4年(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8年(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16年(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18年(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分别先后抵日的唐商团队有李延孝等43人、张言等41人、崔发等36人、杨清等31人；^③在阳成天皇元庆元年(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以崔铎为首的唐商团队有63人。^④

宋王朝建立后，政府认识到民间海外贸易可以带来可观的市舶收入，有助于缓解财政困难的局面，故采取大力支持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宋高宗曾公开对臣下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⑤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尤其是东南地区历来有着注重商贸的历史传统，随

① 武安隆：《遣唐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2—175页。

② (日)藤原良房等撰《续日本后纪》卷十七，承和14年七月，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吉川弘文馆，1979年。

③ (日)藤原时平等：《日本三代实录》卷六，贞观四年七月；卷十三，贞观八年十月；卷二十六，贞观十六年七月；卷二十九，贞观十八年八月，日本醍醐天皇延喜元年(901)本。

④ (日)藤原时平等：《日本三代实录》卷六，贞观四年七月；卷十三，贞观八年十月；卷二十六，贞观十六年七月；卷二十九，贞观十八年八月，日本醍醐天皇延喜元年(901)本。

⑤ 李心传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六，绍兴七年闰十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86页。

着区域社会经济在长期开发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走向繁荣，特别是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活跃，经商逐利风气愈盛。时人感叹地说：“今世积居润屋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频取仰给，争锥刀之末，以滋贮储。”^①海外贸易利润丰厚，“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②，由是吸引人们纷纷参与其中，出海逐利蔚然成风。这些因素的结合，加上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促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贸易的空前兴盛。有学者统计，“北宋中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 1666.6 万缗，北宋后期的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 2333.4 万缗，南宋绍兴晚期每年的进出口总额为 3777.8 万缗。”^③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海商群体不断壮大。“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④据朝鲜文献《高丽史》记载，从高丽显宗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到高丽忠烈王四年(宋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 年)，先后赴高丽的宋商舰队有 130 批次，其中确知人数的有 87 批次，合计达 4955 人。^⑤这为数众多的海商，首先，从社会构成来看，涉及诸多阶层。第一，有豪商富室。南宋时，都城临安的富室有不少系“外郡寄寓之人”，其中“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⑥。时人洪迈在《夷坚志》中提到，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时”；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临安人王彦太“家甚富，有华室，颐指如意。忽议航南海，

① 范浚：《香溪集》卷二十二《张府君墓志铭》，《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

②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民国宋人集本。

③ 熊燕军：《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④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民国宋人集本。

⑤ 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69—279 页。

⑥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恤贫济老》，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年，第 162 页。

营舶货”^①。第二，有官僚贵族。虽然宋政府明令禁止在任官员经营贸易，规定官吏不得“苟徇货财，潜通交易，阑出徼外”，也不准“遣亲信于化外贩鬻”^②。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官员经商风气愈禁愈盛。从达官显贵到一般胥吏，不“以营利为耻”，而“专为商旅之业”，官员中甚多“懋迁往来，日取富足”者。^③海外贸易的收益远超一般商业活动，自然吸引着不少官僚贵族置禁令于不顾，积极参与其中。如北宋时，名臣苏轼曾“贩数船苏木入川”^④。南宋时，广西雷州知州郑公明“三次搬运铜钱，下海博易蕃货”^⑤；大将张俊遣手下老卒出海贸易，“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⑥；理宗朝宰相郑清之的儿子“盗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⑦。即使是皇室宗亲也不例外。宋高宗绍兴(1131—1162)末年，鉴于当时泉州南外宗正司的不少宗族人员参与海外贸易，凭借特权横行不法，宋廷不得不下令禁止：“两宗司今后兴贩蕃舶，并有断罪论。”^⑧第三，有沿海农户和渔民。福建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沿海居民转而从事海上贸易的现象颇为常见。“漳、泉、福、兴化滨海之民……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⑨广东沿海诸郡的居民“或舍农而为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贩”^⑩；浙东台州仙居人郑四客原是个佃户，“后稍有储羡，或出

① 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三《海山异竹》，志补卷二十一《鬼国母》，支乙卷一《王彦太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1页；洪迈：志补卷二十一《鬼国母》，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86页；洪迈：支乙卷一《王彦太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96页。

②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

③ 蔡襄：《蔡忠惠集》卷十五《废贪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遗》卷六，熙宁二年十一月己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6页。

⑤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20之3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

⑥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老卒回易》，明刻本。

⑦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零七《杜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282页。

⑧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十四之四十三。

⑨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百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

⑩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六之十六。

入贩贸纱帛、海货”^①。第四，有部分僧道人员也加入海商的行列。如杭州僧人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②；《夷坚志》三志己卷六提到，泉州人王元懋“少时祇投僧寺”，后从事舶货贸易，“其富不赀”。其次，从经营规模和方式来看，有的海商资本厚实，经营规模庞大。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③；另一海商王仲圭拥有众多海舶，一次出海贸易就能“差拨海船百艘”^④。有的海商资本有限，无力独自出海，只能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转相结托，以买番货而归”^⑤；或者依附大海商出海贸易，租赁海船仓位，“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⑥。

在不断壮大的宋朝海商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主要经营对日贸易。据有关学者考证，北宋时期，先后赴日本的宋朝海商船队中可以判明的就有 70 多次，实际次数显然较此要多得多。^⑦ 到南宋时期，由于日本放宽对海外贸易的限制，宋商赴日更为活跃。为数众多的海商不仅频繁往来于宋日之间，不少人还长期寓居日本，有的甚至加入日本籍。日本博多的“宋人百堂”，便是 11 世纪末以来在宋商汇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华侨居留区。南宋时，长期从事宋朝与日本、高丽贸易活动的临安人谢国明，在定居博多后，成为当地商界的领袖人物。因此，海商群体在推动宋日经济交往的同时，对于打破两国间的外交僵局，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海商群体与宋日政治关系

两宋时期，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其中缘由具体为：

^① 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一《郑四客》，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918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五，元祐四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0493 页。

^③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六《泉州杨客》，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88 页。

^④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50 之 2, 3 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影印本。

^⑤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民国宋人集本。

^⑥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 149 页。

^⑦ 王勇、郭方平等：《南宋临安对外交流》，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 年，第 108 页。

一方面，宋王朝建立后，一直面临周边民族政权的威胁和内部统治问题的困扰，无暇也无力像汉唐两代那样大力追求四夷宾服、万国宗主的地位，因而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收缩对外政治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在宽平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以“大唐凋敝之具”，赴唐使团“或有渡海而丧生者，或有道贼遂亡身者”为由，终止了已持续两个世纪的遣唐使。^①延喜年间（901—923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的海禁令。唐保四年（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藤原氏掌控朝政后，进一步强化了日本自我封闭的“锁国”政策。不过，宋朝在收缩外交关系的同时，又开放国门，鼓励民间对外交往，而日本政府的海禁政策也主要是针对本国商民，并不禁止宋商赴日活动，对宋商只是加强管理。在这种背景下，宋商便承担起促进宋日政治交流的任务。

北宋初期，中日之间的政府交往完全中断。对于海商来说，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为此，他们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推动两国政治交往的正常化。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日本东大寺僧商然及其弟子五人随宋商陈仁爽等来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宋真宗时，在日本留居七年的福建建州商人周世昌回国，一同前来的有日人藤吉木等。真宗召见了藤吉木，并赐予礼物。海商不断地带日本人前来朝见，逐渐激发了宋政府与日本交往的兴趣。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朝主动派使者携带牒文和礼物赴日，日本天皇令式部大辅高阶积善做牒文回复，又于万寿三年（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令大宰府派使者赴宋都汴京进献礼品，由此打破了两国官方互不往来的僵局。到宋神宗时期，宋政府更是连续四次以海商为使者，赴日递交国书，掀起了中日官方交往的一个小高潮。

熙宁六年（日白河天皇延久五年，1073年），宋廷派海商孙忠与日僧成寻（一作诚寻）携带神宗御笔文书和礼物赴日。日本政府反应冷淡，拖延了很久才召开公卿会议进行讨论。由于日本政府对宋朝国书中“回赐日本国”等字句

^① （日）《管家文草》卷九《奏状·请令诸公卿议议定遣唐使禁止》，《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三，东京：日本东京都档案会，1964年，第75页。

不满，决定不予理睬。“诸卿定申大宋皇帝付孙忠献锦绮事，不可遣答信物。”^①直到承保四年（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才以主管贸易的大宰府名义回复。次年初，孙忠与日通事僧仲回一起回到明州。当地官员报请朝廷：“得其国大宰府牒，因使人孙忠还，遣仲回等贡色段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以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请自移牒报，而答其物直，付仲回东归。”^②日本政府想竭力回避对宋的朝贡关系，故拖延多年才回复宋方；宋政府则力图确立对日的宗主国地位，不满日方移牒己方贸易机构市舶司的做法，故此次两国以海商为信使的交往没有结果。

宋神宗元丰元年（日承历二年，1078年）十月，孙忠再次携带宋廷官牒和礼物赴日，结果进一步引发日本政府的疑虑，认为两国“和亲久绝，不贡朝物，今日频有此事，人以成狐疑”^③。元丰三年（日承历四年，1080年），就在日本政府对是否接受宋朝牒书犹豫不决的时候，宋廷让另一海商黄逢带第三份牒书赴日，表面上是询问孙忠何以迟迟不归，实则是催促日方尽快回应宋廷的要求。次年，宋廷再次派海商黄政（王瑞垂）赴日递交第四份牒书，要求日方将孙忠等人“请疾发遣，回归本州，不请留滞”^④。面对宋廷接二连三地送来牒书，日本政府仍坚持对宋朝敬而远之的立场，决定给予礼节性回信，并由宋商捎带回去。

北宋后期，宋廷虽继续通过海商向日本传递国书，却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及宋室南渡，面对北方金王朝的进逼，南宋政府一度无暇顾及与日关系。直到宋孝宗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趋于稳定，而日本在经历“平治之乱”后，平氏家族掌控了朝政，开始调整“锁国”政策，对宋日贸易由控制转为鼓励，宋廷

^① （日）《百练抄》，《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五，东京：日本东京都档案会，1964年，第340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一《日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37页。

^③ （日）《百练抄》，《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五，东京：日本东京都档案会，1964年，第323页。

^④ （日）《水左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五，东京：日本东京都档案会，1964年，第356页。